

中国现代政治史诸问题初探

郭贵儒 著

東方出版社

中国现代政治史诸问题初探

郭贵儒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嘉

装帧设计:兰林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政治史诸问题初探/郭贵儒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2

ISBN 7-5060-1557-9

I. 中… II. 郭…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②中国—现代史—民国—文集 IV. ①D23-53 ②K258-53

中国现代政治史诸问题初探

ZHONGGUO XIANDAI ZHENGZHISHI

ZHUWENTI CHUTAN

郭贵儒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石家庄市飞达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18千字 印数:1—1,000册

ISBN 7-5060-1557-9/K·340 定价:18.50元

卷首语

十几年来,自己在教学工作之余撰写了40余篇文章。成果寥寥,不值一提。原本也没有把这些文章汇编成集的想法,窃以为尚不够格。但后来还是经不住师友的鼓撺,加之有关方面给与一定的支持,遂决定把这些不成熟的东西先抛出来再说。一来可作“抛砖引玉”之用,二来也可作为自己十数年来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的一个回顾和检讨。

这些文章有的是为了解答自己在学习中的疑惑;有的是为了回答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对学术界某些传统观点提出一点商榷意见;有的则是自己在完成某项课题时的副产品,等等。虽然学术平平,但有些文章多少还能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或挖掘一些新材料,引起了一些学界同仁的关注。

本书收录的二十几篇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中共党史方面的文章,有12篇。一类是有关民国史方面的文章,有8篇。其中绝大多数可算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范畴,另有2篇中国现代经济史方面的文章也附录其后。这些文章除个别篇目系与同仁合撰外,基本都是自己的作品。

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加之史料所限,书中有些观点难免有不尽允当之处,史实叙述和史料运用也难免有不周之处。尚祈读者不吝赐教,以备自己修正和提高。

作者谨识

2001年10月

2001/10/2

目 录

卷首语	(1)
五四运动与民主意识的觉醒	(1)
李大钊社会主义民主观简论	(4)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 与中共“六大”	(11)
共产国际是何时把“调和主义”帽子加之于中共六届三中 全会的	(19)
“联蒋抗日”的口号是谁最先提出来的	(31)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简政工作述论	(35)
略论西柏坡时期党和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	(45)
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58)
试论 50 年代我国的舆论监督及其历史作用	(74)
毛泽东对外经济交流思想概要	(90)
建国初期河北省贯彻人权保障政策述评	(101)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克服官僚主义 ——重读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117)
关于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几个问题	(123)
南京国民政府与热河长城抗战	(147)

试论汪精卫与《塘沽协定》	(164)
华北事变前后的日本华北走私述评	(185)
南京国民政府与绥远抗战	(200)
浅论日本的毒品政策及其在华北的实施	(219)
1946 年国民政府“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工作述略	(232)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财政经济迅速崩溃原因初探	(244)
试述统一累进税在晋察冀边区的实施	(258)
陈云与建国初期稳定物价的斗争	(271)

五四运动与民主意识的觉醒

作为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进了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

中国人初识民主，并非从五四开始。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一些改良派和维新派志士即对“一人秉于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发起过冲击，指出了“上权太重，民权尽失”的弊害，提出过“人人应有自主之权”的呼声。及至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概称“三民主义”），并以民权主义，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革命政纲的核心。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实现了 20 世纪第一次历史巨变。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封建专制主义又卷土重来，但民主进步的闸门既已开启，其发展的趋势便无法阻挡。

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几年，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倡导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在知识界勃然兴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从一开始就高擎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坚决的批判精神和无畏的战斗勇气，对以孔儒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发动了猛烈攻击。历代统治者推崇的神化了的“至圣先师”被从充满灵光的殿堂上推下来，而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新观念则广为弘扬。新文化运动所使用的批判武器虽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器库中拣来

的,但它对长期处于扼杀人的个性、窒息人的灵魂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却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使人们尤其是广大知识青年打破了“崇古尊圣”的精神镣铐,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唤醒了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新思潮的激荡和新派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为日后发生的五四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意识的新觉醒。“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即是这种新觉醒的例证。如果说,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还主要是在文化心理的方面唤起人们对个人独立人格和自由权利的追求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则给予人们以另一种启蒙,即在社会变革上打破了对圣贤、上者的迷信,发现了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巨大潜在力量,从而把争取个人自由权益的努力同争取国家、民族权益的斗争有机结合起来,“改造社会”的呼声更趋高涨。这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飞跃。

尤应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迪,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逐步认识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改变了对西方民主的简单而幼稚看法。虽然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但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终究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谈论社会主义成为当时进步人们的一种时髦话题,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变化和特色。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观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他们已逐渐认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狭隘性和虚伪性,开始抛弃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转向了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民主的意识必然转变为争取民主斗争的行动。到国共合作的国民

革命时期,依靠工农群众争取民权,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大量事实说明,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迅速觉醒,并在实际上已成为激励他们投身于国民革命洪流的精神动力之一。

80年过去了,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仍然泽被着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迎来了科学与民主的春天。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已被党中央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写入了党的基本路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被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所有这些,都是党和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五四精神的弘扬和超越。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如此,则将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最好的纪念。

(原载《河北日报》1999年5月11日理论版)

李大钊社会主义民主观简论

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也曾为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所吸引,为阐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出过震古铄金的呐喊。但当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愈来愈暴露出其种种弊害之后,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李大钊便独具慧眼,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而且是自由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并认为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①显然,李大钊已经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工农苏维埃制度,看成了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彻底的民主制度,并把这种新的民主模式视为20世纪民主运动的“新潮流”。自此,李大钊很快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了界限,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当成了自己追求的奋斗目标。用民主的观点解释十月革命的意义,解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李大钊该时期政治思想的特色之一。

从1920年到1923年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自由与秩序》、《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社会主义释疑》等文章和讲演,就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即

^①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8页。

Democracy)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和“纯正平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等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在驳斥社会主义“扼杀民主自由”等谬论的同时,原则性地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观。这些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民主,而且要发展民主,它在精神上与德谟克拉西“亦复相同”。1921年12月中旬,李大钊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一文中指出:“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①1922年7月,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再次指出,“平民主义”是今日风靡全世界的“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普被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②李大钊在探讨社会主义与民主关系问题时,把二者视为是根本一致的而非对立的,并对此一再加以强调,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比同时代的其他人确实有着独到之处。现在看来,他的这种认识有着很大的合理性和超前性。

为了使人们能够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的关系,李大钊还专门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当时人们的某些疑问。

针对有人耽心社会主义扼杀个人自由的种种疑虑,李大钊明

①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6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4页。

确指出：“过渡时代的社会主义，确是束缚个人主义的自由，因少数资本主义者之自由当然受束缚，不过对于大多数人的自由确是增加。故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使农工等人均得自由。”^①李大钊在《社会主义释疑》一文中还指出，那些误“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自由的”人们，实际上是“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据有，我们如牛马地劳苦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地供养。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应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②鉴于有人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误为一物”的错误认识，李大钊还指出：“实则社会主义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种权力，使之伸张，以保障每人享受极大的平等、自由。”而无政府主义恰恰“与社会主义绝对相反”。^③在这里，李大钊实际上指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自由”的极端虚伪性，指明在“过渡时代的社会主义”，只有少数剥削者的自由受到束缚，而这正是为保障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所必需的。而经济上的平等自由与否，则是考察一个社会平等自由程度的最重要的尺度。针对有人关于社会主义不允许竞争的误解，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因为“社会由竞争而进步的，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社会主义所禁绝的，只是资本主义那种“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的竞争。^④此外，李大钊还批驳了所谓社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75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672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374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437页。

会主义“破坏家庭”、“破坏生产”、“导致贫穷”、“阻碍艺术”等种种谬说,指出:社会主义不但不破坏家庭,而且要建立“比现在的家庭更趋完善”的家庭;社会主义不仅不破坏生产,而且要“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地发展”,“使生产品有计划地增殖”;社会主义不会导致贫穷,相反是要使绝大多数人富起来,“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社会主义“不但不妨碍学艺,而且使之发展”,倒是资本主义不但使“人类生活经济上受其苦窘”,“即学艺上亦大受其压迫”。李大钊的这些论述,用比较的方法阐释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广泛真实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这对于澄清人们的诸多疑虑,引导人们趋于社会主义的信仰,有着重要的启迪和积极的意义。

(二)关于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这也是当时人们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亦是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容易发生误解的问题之一。李大钊认为,自由是相对于秩序、个人相对于社会而存在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夸大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安排的;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因此,“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但“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① 李大钊对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分析,既澄清了某些人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438页。

对社会主义会“抹煞个性发展”的担心,又驳斥了极端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一切秩序和权威、主张极端个性权能的谬说,是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观的又一有力说明。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纯正的平民主义”、即“真正的工人政治”的必经阶段。李大钊认为,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民主政治,即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平民主义’”,又称“工人政治”。工人政治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但“真正的工人政治”,即废除了统治与服属关系的“纯正的平民主义”,不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之后可以立即实现的,而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虽然也称“工人政治”,但仍然“含有统治(Rule)的意味,而且很严,大权集于中央政府,实行统治别的阶级,这就是以一阶级的权力,替代他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统治。这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段”。但“随着无产者专政状态的经过”,“到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废除,失去了复活的可能的時候”,“Er-gatocracy(即工人政治——笔者)的内容将发生一大变化。他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消泯,以事务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此时的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因为那时除去老幼废疾者,都是作事的工人,没有阶级的统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①要言之,李大钊根据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把阶级消灭以后,废除了统治意义而只保存“对事务的管理和执行”意义的“工人政治”,视为是人类历史上最理想、最高层次的民主政治。同样,李大钊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这种最理想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无产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572页。

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一方面要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防止其复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大力普及社会主义精神,从而为实现“纯正的平民主义”创造政治上、经济上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从民主的角度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把实现最彻底的民主政治即“纯正的平民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起来,是李大钊社会主义民主观的一大特色。

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关系的这些论述虽然还是原则性的,有些表述难免尚欠全面和确切,但他明确表露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即“平民主义”(民主主义)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演进的程级甚多”,从古希腊城邦时的“平民主义”,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平民主义”,再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人政治”,再到阶级消灭世界大同时的“纯正的平民主义”,乃是民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程级”。这个观点的重要和可贵之处,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看作既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狭隘性与虚伪性的否定,又是对其某些合理的民主内涵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在批判地吸收人类历史上民主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主政治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广泛和真实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级民主的途径和手段。社会主义民主也是按“程级”逐步递进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尽管李大钊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表述,但他已具有这样的思想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像李大钊这样,从理论认识上把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同民主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强调二者的统一性,明辨二者的辩证关系,这在当时

的中国还找不到第二人。与陈独秀等人只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忽略民主的继承性,只注重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意义,而忽视其民主内涵的思想相比,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明显更高一筹,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原载《燕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转载)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与中共“六大”

1928年10月初,毛泽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该决议的一部分)。11月25日,毛泽东又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长篇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在这两篇文献中,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建立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经济特点的分析,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论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关系,从而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尔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毛泽东在这两文中还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的开篇即明确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